系学院（2011年）、南开大学（2012年）、复旦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年）、广东外贸外语大学（2014年）、郑州大学（2015年）、青海社会科学院（2016年）、西南财经大学（2017年）、云南民族大学（2018年）、南开大学（2019年）、海南大学（2020年）、宁夏大学（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国际关系学院（2022年）、新疆大学（2023年）作为年度论坛主办单位积极参与其中。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的设立标志着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共同体的成立，为学者们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了交流平台。参与论坛的人员既有来自政治学界的学者，也有来自经济学界的学者，这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交叉学科高质量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之所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许有许多原因可供探究，但这四件大事不但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在中国得以制度化，而且也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成为可能。

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 内在融合与促进

李 滨*

国际政治经济学从流派上可以分为三个流派：马克思主义流派、现实主义流派和自由主义流派。这三大派都有宏观与微观的研究分野，但在微观分野上与比较政治经济学密不可分。从这一视角看，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流派的研究集中地反映在两个领域：一是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研究和（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运动的研究，二是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研究。^①前者研究集中在世界范围内对被压迫阶级或国家

* 李滨，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

① Jeffrey A. Friden and David A. Lake, ed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 (4th ed.), Routledge, 2003, pp. 11-12.

的研究(类似于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的研究),属于一种微观研究;后者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研究,大体属于一种宏观研究。前者以“依附理论”为代表;后者以世界体系理论和全球资本主义研究为代表,而“葛兰西主义学派”则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研究与西方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理论。比如依附理论微观研究的色彩就比较突出,主要针对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下为什么不发达的具体现实;而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研究则宏观层面的特点更明显,集中研究资本主义作为体系整体的发展与演变。

这两个领域是有一定相互联系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大体都是一种整体的理论,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结构对世界各国的影响(或者说帝国主义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通过内部的生产关系以及政治、文化结构体现出来不同的特点。只要读过依附论的学者都可以发现不同的依附学者都是以不同的国家作为研究的对象,有的以巴西为案例,有的以阿根廷为案例,有的以新兴工业化国家如巴西、墨西哥为例,有的则把这些国家与那些发展停滞的国家(如厄瓜多尔、洪都拉斯)比较。虽然总体被概括出一些共同的特征,但在具体形式上各有特点,带有内部不同的具体的原因分析。后者严格说,是一种比较政治经济学。当然对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研究离不开对整体资本主义体系影响的研究。

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有两种研究角度。一种强调国际关系权力分配格局或国际政治结构是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它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联系较为密切,是一种宏观的研究;另一种重视国内的官僚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特征和利益分配关系对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作用,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受一般政治学和行政学理论的影响,如被称为“官僚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就受到两方面理论的影响,一是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概念,二是美国组织理论中“非理性”官僚概念^①。后一种研究可称为微观研究。

这两种研究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而是各有侧重。在宏观理论中,最著名的就是“霸权稳定论”。宏观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国内政治因素作用,如果读过“霸权稳定论”,可以发现霸权的衰落形成的原因以及后霸权国的对外反应与不同的制度、国内政治经济有着一定的联系。微观研究虽然以国内体制作为应对外

^① Peter Katzenstein, ed.,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p. 14.

部政治经济为研究焦点，但也是以一定国际政治结构为前提的，即在外部的影响，国内的政治精英、游说集团和不同官僚集团是怎样以自身的利益对外部作出反应的。微观理论以彼特·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彼特·艾文斯（Peter Evans）等人的一些作品为代表。比如卡赞斯坦所编的《权力与丰裕之间》就是选择不同的发达国家应对外部经济的反应，从中分析了它们内部体制对这种反应内在的作用。所以，这种微观的现实主义研究由于多从国内政治特点来分析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因此往往带有比较政治经济学成分。

自由主义流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也同上述两个流派一样，有宏观与微观研究之分。宏观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强调世界经济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的改造作用。这其中也存在极端主义的观点，即认为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已经让位于市场，国家主权受到了一些巨大的跨国公司权力的侵蚀，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正在逐步过时，并将其权力转让给更能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跨国组织，声称技术和市场的发展使经济消融政治已不可避免。

以自由制度主义最主要的代表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 Jr.）作品为例。两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所写的《权力与相互依存》是自由制度主义的开山作品。该书的两位作者认为，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政治关系中的主体，但相互依存的现实已经使得传统的军事权力主导国际关系的状况有所改变，军事权力在国际经济等领域的作用已经下降，对权力的认识不再简单化，因为控制结果的能力在各个领域中是不同的，而且国家的权力受到跨国机构的制约；因此，在这种复杂而又多层次的政治中，虽然传统权力政治仍然存在，但新的政治特征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也出现了，这种新的政治特征要求合作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最佳方式。^①这其中谈到经济相互依存对国际政治的改造与改良作用。

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是最能体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著作。作者基欧汉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他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制度是一个国际行为体与结果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

^① 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吉尔平：《权力与相互依赖》（英文影印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制度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未来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但由于国际制度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制度的秩序而言,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的国际制度仍能相对地促进国家利益。^①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舞台的主要行为体,是一个理性行为体,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国家利益存在着冲突等。但是,他认为,国家在一个有国际制度的世界经济中仍可以得到益处,它们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即“两弊相较取其轻,两利相较取其重”的选择来比较没有体制和有体制下的利益得失,从而选择保留既存的国际制度,即选择合作。因为没有制度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制度还可能存在着成本过大等不利因素。两者比较,前者比后者相对要好。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虽然沿用了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假定,但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行为角色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是自我利益的绝对增加,而不是相对于他国的利益增加。同时,基欧汉的理论引入现代经济学的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甚至包括某种福利经济学的思想)。

基欧汉继承了国际制度是一个公共商品的观点,它存在着“免费搭车”的无人付费的问题。同时,基欧汉引用多重博弈的思想,认为国际制度起到一个多次重复博弈状态下“未来阴影”的作用,使欺诈/背叛将来所付出的代价更大,由此可以减少欺诈/背叛。基欧汉把公共选择理论引入到他的国际合作的思想中,强调国际制度的设计必须体现出某种福利经济学的思想,即在增加自己利益的同时,也可以增加其他人的利益,至少不减少其他人的利益。他认为,美国在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因此,他相信,即使美国的霸权衰落后,由于国际制度的潜在优点和国家作为一个理性行为体的思维,也可能继续维持这种国际制度,维系合作。正是这种工具理性的思维下的世界经济

^① 关于自由制度主义的阐述参照了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和吉尔平的《全球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第四章的有关内容。

现实只能维持，从而克服传统的权力政治的弊端。

当代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微观研究（如果算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话），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国际经济关系变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对国内政治的改造上，注重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对国家内部政治关系的作用。这种研究也同样具有一定的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色彩。与宏观理论（应该说宏观理论中也有对国内政治的分析，但研究的重点是国际政治特征）相比，这种研究在国际研究领域影响力较小，但也不是没有出名的作者，如丹尼尔·尤金（Daniel Yergin）约瑟夫·斯坦尼斯洛（Joseph Stanislaw）的《制高点》（*The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Economy*）就是一部有名的比较研究作品（获得过普利策奖）。这一作品通过各国的比较，提出了什么样的国内体制、治理与改革最能赢得世界经济竞争的制高点。所以，如果仔细分析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宏观与微观研究，也可以发现两者都有联系，特别是微观研究中对宏观研究整体结构性影响的采纳。

三个流派的案例说明，比较政治经济学离不开宏观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各国政治经济体制特征甚至是历史演变过程，都与外部世界的政治经济整体结构有关。因为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一个最具有扩张色彩的生产体制，它影响着世界各国，成为制约各国政治经济的外部结构。而各国既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传统与制度在与外部结构的碰撞中又产生了不同的兼具一定特色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实践，即使其中一些体制和实践具有一定的趋同性。这为各国政治经济的比较与分析提供了来源。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应当是静态的，仅仅分析一些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即时性的特征，缺乏对动态的政治经济体制与实践的分析。这种静态的描述似乎可以不要宏观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如果关注动态的各国政治经济体制与实践，必然需要宏观的结构及其演化的分析。

同样，注重宏观研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也离不开微观的研究。如果没有对大国的政治经济深入的分析，就无法对世界政治经济的演进做出历史而具体性的分析，往往形成一种历史循环的简单叙事。因为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或者说世界秩序）总是体现出一定的历史阶段性特点。如英国治下的世界秩序、美国治下的世界秩序和全球化下的世界秩序都带有大国塑造的特点。忽视了这些特点的宏观研究似乎对现实是没有实际意义。这就是一般到具体的作用。没有具体就无法让人认识细节特征，也无法形成改造现实世界的方案。因为从“人类历史发展

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如果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而且“也不可能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①

正因为如此，注重宏观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只有与注重国别微观研究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相互融合，才能促进两个不同的政治经济学共同发展。宏观研究为微观研究提供比较与差异的大背景，而微观研究为宏观研究提供时代、区域和国别的差异的素材。

关于建构国际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考

张建新*

发轫于英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地位可谓如日中天，以至于美国的《国际组织》杂志在其50周年纪念刊中，“毫不犹豫地将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解读框架，对国际关系学进行了新的解读。”^②正是在这期间，国际政治经济学悄然进入中国。当下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已经发展到第四代学者，而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三代学者也已经登上了学术舞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从构建国际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来说，中国几代学者都进行了自觉的探索和努力，但依然任重而道远。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召开第七期比较国际政治经济圆桌会议，来自各高校的同仁相聚于斯，围绕“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教材建设与交叉学科发展”这个主题展开对话，正是对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这一重大学术使命的回应。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6页。

* 张建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② 达里奥·巴蒂斯特拉：《国际关系理论》，潘革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96页。